

工藝交易與傳統物件交織的文化光譜—館藏平埔族群生活器物概述

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吳佰祿

描述、採錄、圖繪異文化印象可說是 17 世紀末以來漢人記錄平埔族群原住民文化形象的主要途徑，透過「文化之眼」聚焦之後，建構出「異文化投射鏡」的框架。這些形象隨漢族與平埔族群原住民接觸深度與廣度的增長，以及清政府原住民管理力量日漸推及西部平原全境，乃透過旅台官員、騷人墨客之手，將他們的親身見聞或彙集的資訊著錄為輿圖、志書、雜記、風俗圖繪等，作為掌握台灣風土民情與施政的參考。這些記錄在清代歷經探索、深化、定調、細緻化等階段，而形成一套平埔族群逐漸為「漢族聲教」、官方管理所「馴化」的論述框架。相對於這類統治論述，行於民間的契約文書、生活器物則反映了平埔族群與漢族接觸後社會格局與生活景象轉變的脈絡與軌跡，工藝交易品與傳統物件交織而成的生活故事與複雜的文化光譜即體現此文化歷史過程。

對平埔族群特殊的歷史際遇與此對其族群特性、文化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的影響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並融入文化資產保存概念，大致以日治時期為濫觴，博物館蒐藏平埔族群文物之風亦於此時興起，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之前身）即為其一，成為「博物時代」的最佳縮影。對於早期異文化的認識，在現代博物館文物典藏中一方面產生新的結合模式，另一方面透過物質文化與社會文化整體脈絡之關係的分析，而試圖將之前形構的早期異文化印象無法完整勾勒出的文化格局予以再現。

再現異文化格局固然是博物館文物典藏的基本旨趣，但「可蒐藏物」(the collectible) 的標準與鑑別，以及「蒐藏手段」(means of collecting) 的組合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文物典藏的格局，同時也形構了典藏調性。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典藏的平埔族群文物就提供了一項可能的切入點。

臺博館原住民與平埔族群文物典藏概況

臺博館典藏臺灣原住民與平埔族群文物之歷史均溯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1908-45），而早在 1896 年，臺灣總督府即頒布「調查山地及原住民」的訓令，從事「採集天然資源及土俗標本」的工作²。建館初期以自然類標本及產業類標本為主要典藏，1921 年以後人文類藏品（原住民文物為其中一部份）的重要性日形顯著，至日治時期將結束時，人文類藏品之規模已與自然類標本不分軒輊³。

臺博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歷史已逾百年，數量約 7000 餘件，就其典藏特色及

¹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原稱為「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1915 年遷入新落成的「故兒玉總督暨後藤長官記念館」內，1945 年以後的「臺灣省立博物館」(1945-99)、「國立臺灣博物館」(1999-) 均沿用此館舍為博物館主體。

²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 1997 (1911)：25-27。

³ 李子寧 2008：18。

脈絡而言，有三項較為重要的面相⁴：

（一）文化歷史的連續性

由於原住民文物多屬日常生活之產物，可再製性高，文物實體存續的生命多不長，早期收藏品其使用年代多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近 30 年所收藏者，則多為 20 世紀初至中葉的產物，某些創作品或形制變化不大的生活日用品，更可能是 20 世紀末的產物。因此，就文物的民族學年代而言，這些文物可說涵蓋了目前原住民族群由傳統至現代變遷的連續性文化歷史過程。

此外，臺博館因典藏歷史的特殊性，不僅彰顯文物之民族學近代文化歷史連續性，也體現臺灣考古學、近代歷史、民族學文物的串連性，而孕育了文物內涵長時限的文化歷史接續性，故其民族學文物所可能具有的「文化詮釋」空間，顯然比民族學單一類別來得廣泛。若將此文化歷史接續性、比較性推及館藏東南亞、大洋洲地區文物，則又突顯出「南島民族」區域共通性、差異性此一更廣泛的課題。

（二）以傳統文物為主的典藏光譜

臺博館臺灣原住民族典藏固然涵蓋不同文化歷史時期之文物，但仍以 20 世紀初以前傳統原住民社會的生活遺物居多。以入藏來源而言，「接收」者為 1945 年承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之文物，「移交」則是 1949、1964 年透過行政移轉分別接管原「省立臺東圖書館」、「省立臺中圖書館」保存之日治前身機構留存下來的文物。屬於這兩類入藏來源的文物合計約 5,300 件，佔館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總數的 76%，且絕大多數均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傳統原住民社會的產物，稱此為臺博館原住民文物的一項核心特質並不為過。這也是在探討原住民社會傳統文化特質、社會工藝形式及其「原始藝術」內涵、原住民對外關係時，臺博館藏文物常被視為一具有代表性的樣本的重要原因。

（三）文物廣泛的社會範疇

臺博館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相當程度上籠罩於早期民族學文物收集的「百科全書式」蒐藏傳統氛圍中，此傳統源自於 19 世紀末在西方現代科學中興起的「自然式調查」(naturalistic investigation)，它強調在研究客體自然的環境中進行客觀的資料收集，廣泛對現象或研究主題涉及的各層面予以充分掌握，這些層面互有關聯的構成一種反映客體特殊性的整體結構⁵。此氛圍利弊互見，但它形構了臺博館藏原住民文物在相當程度上觸及了原住民社會文化各層面之特色，有助於說明原住民物質文化與各項社會文化特質的基本關係，而發揮了以「物」的知識釐清「人」的社會文化底蘊此項人類學知識傳統⁶。此項特點對於當代人類學重新崛起的「物質文化」研究而言，無疑也提供了探討本土文化認知、文化記憶及社會場域的當代建構之關係許多值得參考的線索。

在此原住民文物典藏傳統下，目前（至 2016 年為止）臺博館藏平埔族群相

⁴ 吳佰祿 2009：1-3。

⁵ Lincoln and Guba 1985：193-194。

⁶ 陳奇祿 1958。

關文物約 700 件⁷，其中以中部巴則海（巴宰）族、道卡斯族文物為大宗，北部凱達格蘭族、南部西拉雅族相關文物次之，其他區域群體之典藏數量均不多。文物類型則包括古文書、輿圖、風俗圖繪、照片明信片、書冊雜記、印章戳記、印板、碑記、木匾、生活器物等，另有一批新北市貢寮區龍門遺址考古出土遺物尚未列入統計，故涵蓋了歷史文獻、民族學、考古學等不同範疇，構成互有關聯、年代上約貫穿 17 世紀至 20 世紀的一項典藏。如同其他原住民族群之藏品，這批平埔族群藏品也突顯了本族群獨特文化歷史際遇所孕育出的特殊文化圖像之總體特色。

（一）面向外界與對異質元素成熟的結合能力

對異文化的觀察與記錄，常由與觀察者差異較明顯、其型態較完整、且具有相當地緣廣度的異文化群體開始。平埔族群廣泛分佈於臺灣西部、東北部平原，近代初期外界對臺灣的印象也常「先人為主」地以這些首當其衝的平埔族群為藍本，他們當時鮮活的奇風異俗似乎就是了解臺灣風土民情的「關鍵要素」，同時也是剖析臺灣社會的「活標本」，他們是當時臺灣面向外界、散播新文化種子的最前緣。對許多平埔族群而言，將傳統元素與外來元素交融乃是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透過以物易物或模仿的方式而引進新的生活物資、工藝形式，再循部落關係將這些元素傳遞到其他部落，以增益既有的生活型態，這可能是極司空見慣的文化操作形式，早期金屬器、玻璃瑪瑙珠、木雕的傳播可能都曾藉由這套複雜的多重傳播、區域群體交流的形式而廣泛流傳。但更大範圍的傳播、採借、轉換則是由於 17 世紀末以後與漢族全面的接觸（由南部西拉雅族開其端）導入了多層次的管理體系，逐漸稀釋了平埔族群的傳統地位，導致其社會型態、文化階序秩序、生產方式、交換模式的轉變，最終則被納入「移植的區域體系」之中。在此適應、轉化新遊戲規則的過程中，一種幾乎全方位的文化變遷壓力凌駕各地平埔族群。因此，平埔族群不僅最早吸引近代外界「觀看」的目光，也率先成為外界「接觸」、「滲透」、「轉化」的對象。清代以來平埔族群的文化變遷多源於此，這些轉變滲透各生活層面，或與傳統元素結合，有些則逐步取代原有的傳統形式，族人棲息周旋於此現實情境，日久習於此新生活背景，並仰賴日深。這種重新定調（reorientation）的過程可說是與前述平埔族群在臺灣近代文化本質上的重要性並存的一項文化歷史大環境「硬體」，族人也因此凝練出對異質元素成熟的結合能力。到了 19 世紀後期，在許多地區藉由文化象徵「化整為零」的操作策略而產生由「公領域」轉入「私領域」的傾向，透過這種形式，具有社會調適作用的文化轉換、文化保存并行的策略，在程度上也使其某些文化風俗得以持續存留。

（二）耕耘傳統與本土文化

平埔族群原以各別部落為獨立的社會運作單位，多數時彼此互不統屬，他們雖有密切的部落間關係，並與外界有互動關係，但在 17 世紀之前，從未被納入複雜的「社會政治階序」之中，各部落經長期發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傳

⁷ 本文僅以臺博館藏平埔族群生活器物為討論對象，有關國內外各文物典藏機構相關蒐藏之現況與比較，請見陳文玲、林修澈 2009。

統。如北部凱達格蘭族三貂社適應濕熱平原低地、海岸環境，其傳統領域佔地頗廣，兼有山海之利，生活資源堪稱豐富，且位居聯繫北海岸凱達格蘭族及東部噶瑪蘭族的重要位置，在 17 世紀西荷時期就已是東北部地區頗具規模的平埔族部落，他們從事粗放旱作，以自製陶器烹煮食物，漁獵、採集的天然物資除作為食物、製造生活用具的材料外，也是對外交換的重要物資，對於這些收獲物的飲食方式、搬運與貯藏亦形成一套慣行的風俗。其社會分工以年齡、性別為主要準則，女耕織、男漁獵、製作工具。清初納入行政管轄、漢移民入墾後，三貂社位於漢移民社會的邊陲，「社會相對利益」一面倒偏向漢移民群體的程度遠較臺北盆地、基隆沿海地區為低，部落組織產生適應性轉換⁸，社民亦保留共同祭祀的集體合作模式，若干傳統風俗、工藝乃獲保存，至日治初期伊能嘉矩調查時，猶見殘餘的本土元素，如家屋型式及家屋壁板雕刻、自製陶器、方衣服飾、各種珠串飾、年祭祭祖等⁹，臺博館藏三貂社相關歷史文獻、民族學、考古學文物亦見證了三貂社傳統文化的韌性。

在臺博館藏平埔族群文物之中，歷史文獻類藏品向來受到臺灣史、美術史研究者等的重視¹⁰，龍門舊社遺址推斷應為三貂社早期社址，亦有相關考古發掘報告¹¹。相對於此，民族學生活器物則較少受到討論，這與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近年方重新引起注意、相關素材不若其他原住民各族生活器物常仍具現實生活脈絡、研究資料流通程度等因素均有關。但「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大變」，這是清初以來對於平埔族文化變遷的重要觀察，而對於與外界接觸較早的西拉雅族而言，這似乎更是慣有的印象。相對地，日治時期伊能嘉矩東北部平埔族調查記錄三貂社殘存的早期文化元素，如家屋型式及家屋壁板雕刻、自製陶器、方衣服飾、各種珠串飾、年祭祭祖等，歷來已在考古學、民族學研究中塑造了三貂社在探尋平埔族傳統文化時的關鍵性角色。這種文化歷史脈絡差異格局，如果由博物館器物世界中來審視，是否有蛛絲馬跡可尋呢？

臺博館藏平埔族群生活器物之內涵與特色

臺博館藏平埔族群民族學生活器物計 283 件，其中 185 件為 20 世紀前半葉即進入文物典藏機制的物件，98 件為 1986 年以後方入藏的文物，因此絕大多數物件為 20 世紀初以前之文化遺留。但對於平埔族群而言，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文物是否屬於「傳統文物」，在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範疇之中可能呈現相當差異。這些文物之社會範疇，包括 11 類，其中生活雜器、服飾品最多，佔 68%，

⁸ 清代許多三貂社古文書中均出現「五柱番耆」的記載，且經常由五柱番耆作為與漢族訂立契約時的共同行為人，見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各集，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他們是由部落中原有母系群體的各方代表所組成，部落性祭儀亦由其統籌辦理，而成為集體權威的一項象徵。臺博館藏的一件嘉慶 24 年（1819）三貂社土地墾耕古文書（藏品編號 AH007230）亦是由五柱番耆聯名訂立的。

⁹ 見伊能嘉矩 1898。

¹⁰ 古輿圖中的「康熙臺灣輿圖」、古文書中的「岸裡大社文書」、「新港文書」、風俗圖繪中的「徐澍臺灣番社圖」、「潘敦仔畫像」、平埔族戳記印板為其中較受矚目者，廣泛為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藝術史學者所重視。如翁佳音 2007、杜正勝 1999、蕭瓊瑞 1999、陳龍廷 2003、洪麗完 1997、陳秋坤 2009（1994）等。

¹¹ 見潘瑋玲 2005、陳有貝 2007。

其次為織具、木雕品，佔 20%，其他數量均不多，但仍反映了某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如傳統製陶及祭儀生活的細節，生產工具數量極少。整體而言，其涵蓋面不及館藏多數其他諸族文物，但也相當程度反映出平埔族群文化變遷快速的歷史現象。

表一、臺博館藏平埔族群民族學文物類別

生活雜器	服飾品	農業用具	漁業用具	木雕	祭儀用品
79	109	3	7	15	23
樂器	織具	陶器	模型	武器	合計
2	28	9	1	7	283

這些器物所涵蓋的區域群體，就可初步認定者（160 件），依數量多寡，包括巴則海（巴宰）族（80 件）、道卡斯族（76 件）、凱達格蘭族（30 件）、西拉雅族（28 件）、噶瑪蘭族（5 件）、凱達格蘭族或噶瑪蘭族（15 件）¹²，尤以前二者中部地區平埔族群數量最多，合計超過半數，然道卡斯族器物類文物中 74 件為 2013 年新入藏之文物，其文物背景內涵尚未有系統釐清，其文化脈絡仍有相當空白，故不宜遽予進行論斷。去除此項，則以巴則海（巴宰）族（80 件）、凱達格蘭族（30 件）、西拉雅族（28 件）數量較可觀，且分別代表中、北、南部主要平埔族群的生活圖像。以下分別簡介此三區域群體的典藏概況及其顯露的文化線索。

（一）巴則海（巴宰）族：

文物及典藏屬性		數量（80）
入藏年代	1945 以前	25
	1945 以後	55
文物年代	18 世紀	8
	清代	39
	19 世紀末/20 世紀前期	33
指涉地域	岸裡社	41
	埔里盆地	14
	不詳	25
社會文化 範疇	儀式宗教用具	8
	盛貯收藏用具	1
	服裝	16

¹² 此 15 件為北部平埔族群木雕，日治時期以來的調查資料顯示凱達格蘭、噶瑪蘭族均有使用家屋木雕飾板的風俗，日治時期調查資料指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蒐藏了尾崎秀真於「佐久間財團蕃族品收集計畫」中蒐集的十餘件雕板，而在「佐久間財團蕃族參考品目錄」中也有尾崎氏蒐集「舊社平埔蕃」（三貂舊社）4 件「木雕板」的記錄，但目前仍難以斷定臺博館典藏的 15 件平埔族群木雕是否皆來自於三貂社，以及館藏品中那些屬於尾崎氏的蒐藏品，但是這批木雕屬於北部平埔族群的大致地緣關係應是可以確定的。見伊能嘉矩 1896、新井英夫 1936、王端宜 1974、阮昌銳 1993、李子寧 2009。

	飾品	23
	飲食用具	26
	織具	4
	雜具（生活風尚）	1
	模型（居處方式）	1

資料來源：臺博館藏歷史帳冊、標本帳冊資料

臺博館藏巴則海（巴宰）族生活器物計 80 件，主要涵蓋了本族代表性部落岸裡社與 19 世紀移居埔里盆地的移居部落文物兩大類別，前者器物類型頗為多樣，後者則以織品文物為主。入藏年代一為日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二為 1964 年由省立臺中圖書館移由臺博館典藏，省立臺中圖書館之巴則海族文物原係接收自日治時期臺中州立教育博物館，故這兩批文物之屬性可說皆為 20 世紀前期的早期蒐藏。物件年代縱貫 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記錄了巴則海族由早期與漢族接觸、族群分批遷徙移居，至融入新區域體系的過程，以及原居地、移居地不同族群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地域性差異。涉及的社會範疇亦廣，包括儀式宗教、盛貯收藏、服飾文化、飲食風俗、紡織工藝、生活風尚、居處方式等七類，尤以服飾文化、飲食風俗為大宗。整體而言，帶有傳統色彩者計 42 件，受外來元素影響而產生或傳入者計 38 件，且呈現地域性差異。採自埔里盆地之生活器物，突顯至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時，儀式性服飾、儀式宗教之傳統特質在移居地仍展現旺盛的活力，反映出群體力量及文化認同相當程度的穩固性；採自岸裡社者主要來自於領部落風氣之先的權威核心群體，在此則突顯了本族原領域自 18 世紀初與漢族密切互動後，新生活風尚與品味逐漸凌駕傳統風格的文化消長趨勢。

（1）儀式宗教用具：包括 4 件埔里盆地部落性傳統「年祭」「走鏢」賽跑活動所頒授之優勝布掛旗，年代約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另 4 件為採自岸裡社之家族性祖先祭祀活動用具，置於家族公廳中，其形式頗受漢族影響，其中一件「弓挑」形如漢式扁擔，更反映了外來文化價值由外而內的多重文化意義轉換的過程¹³。



¹³ 平埔族群搬運物品時原以肩背，未如漢族以扁擔肩挑。岸裡社因與漢族接觸較早且密切，受漢文化影響，而引進「扁擔」以肩挑物的概念，「敦翁行樂圖」中即出現此文化歷史形象，「康熙臺灣輿圖」亦描繪清初大甲一帶道卡斯族人以扁擔肩挑物品的場景。同時，漢式家族概念亦深入該社，本件形如扁擔的祭器即循漢式古禮而生，成為大家族家祭的禮器。

(2) 盛貯收藏用具：1 件採自岸裡社的漢式精美漆器箱，以收存貴重物品，可能為 18 世紀遺留下來的物品，顯示外來生活風尚逐漸融入部落中的文化現象。



(3) 雜具：1 件採自岸裡社的「薰籠」(暖爐)，為漢式錫器，可能為 18 世紀遺留下來的物品，突顯悠雅的外來生活風尚移植到部落社會的現象。



(4) 模型：根據岸裡社總通事家族舊藏建築圖手稿，於 1936 年所作之家屋模型。模型本體為岸裡社最興盛的總通事潘敦受官方許可於 18 世紀所營造的仿漢式三合院家宅，規模宏偉，後為歷代子孫所居。此家屋反映出漢式「家族」概念逐漸滲透，功名、原漢中介人、土地家族等社會身分地位標示的新概念興起之歷史過程，精美的漆器箱、悠雅的薰籠亦為此過程的產物。



(5) 服飾文化：計 39 件，包括儀式性服飾、社會階層象徵飾品、日常服飾三部份，呈現巴則海族人應對大環境的不同策略，市場制度的影響力也滲透其間。儀式性服飾計 21 件，包括上衣、前遮片、額飾、頸飾，文物年代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此類服裝展現繁複的紡織工藝與傳統社會服制，於重要場合及舉行部落性儀式時穿著，採自埔里地區的服裝多屬此類，飾品則融合了本土與外來交換物資，利用穿綴、拼貼、縫飾技法製造色澤鮮麗的效果。



社會階層象徵飾品計 15 件，皆為岸裡社總通事家族清代之傳家物，包括頸飾、銀銅戒子兩類，頸飾為清政府賜封之物，戒子多戴有精美的祥瑞裝飾或鑲金，兩者俱反映特殊的社會權威及社會階層結構。日常服飾計 3 件，文物年代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1 件為埔里地區客式女子長袖長衣，2 件為瑪瑙頸飾，顯示日常服飾在相當程度上已頗受外來文化影響。



(6) 織具：為 4 件傳統紡織工具，圓筒形「經卷」為其主要代表，文物年代約為 19 世紀或更早，為岸裡社總通事家族保存的早期用具，足以作為連接早期歷史文獻與近代民族學現象的一項證據¹⁴。「經卷」筒徑大、函口寬，其形制

¹⁴ 清代文獻中有許多對於巴則海（巴宰）、道卡斯族傳統紡織工藝，及族中婦女善於製作精美織

與巴則海族偏好「寬衣身」的使用慣習頗為吻合，即「經卷」的形式與服裝的使用社會脈絡是相互搭配的。臺博館藏埔里地區採集的巴則海族服裝，「寬衣身」者亦佔較高的比例，其傳統服裝、服制延續的時間亦較臺中原居地為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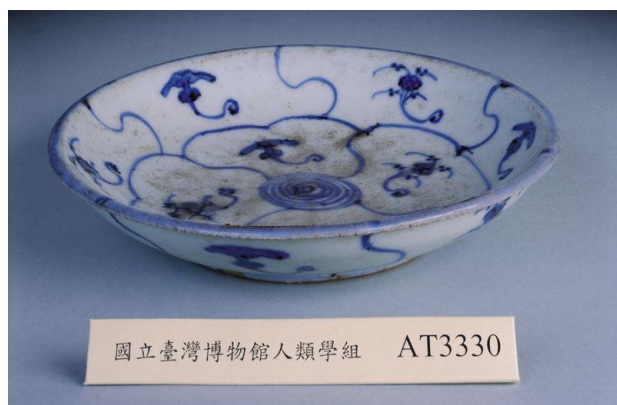
(7) 飲食風俗：包括 15 件傳統木盤、木蓋、木杯，與本族食器分類有關，10 件漢式酒器、茶杯、瓷碗、木盤、青花盤，1 件因鐵鍋傳入而產生的木甌新類型，皆為岸裡社文物，整體而言，反映了岸裡社飲食文化兼納傳統與外來元素的多樣性型態。傳統食器中，有圓形雜食盤、盛鹿肉大方盤、盛魚小方盤之不同類型，木杯似為祭祀用的盛酒器，可能皆為 19 世紀的物品，至 20 世紀初岸裡社食器可能已以市場採買品為主了。



漢式食器在岸裡社可能早在 18 世紀就已與傳統食器併行，並日形普遍，19 世紀中國南方窯場（如德化瓷）的民間陶瓷器大量湧入臺灣，岸裡社民也使用這類器具，某些崛起的勢力家族更將漢族精緻飲食風尚納入生活品味中，如岸裡社

品的相關志書描述、圖繪。臺博館藏巡台御史林天木「臺灣巡視圖」（摹本）即可見 18 世紀以前中部平埔族群婦女以圓筒形「經卷」於屋簷下、戶外紡織的場景描繪。見蕭瓊瑞 1999：142-143/342-350、吳佰祿 2011。

的 2 件錫酒壺就反映了此社會傾向。以木甑而言，本族原以陶甑為烹煮器，鐵鍋傳入後，置木甑於盛水之鐵鍋中，口上再蓋木蓋，以烹煮米粟。



(二) 凱達格蘭族

文物及典藏屬性		數量 (30)
入藏年代	1945 以前	30
	1945 以後	0
文物年代	19 世紀末/20 世紀前期	30
指涉地域	三貂社	29
	淡水	1
社會文化 範疇	儀式宗教用具	2
	盛貯收藏用具	4
	飲食用具	8
	織具	9
	樂器	2
	陶器	1
	飾品	4

資料來源：臺博館藏歷史帳冊、標本帳冊資料

臺博館目前典藏了 30 件凱達格蘭族生活器物，全數為日治時期博物學者尾崎秀真於 1927-29 年擔任「佐久間財團蕃族品收集計畫」委員期間（尾崎時亦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蒐集，而後於 1930 年代入藏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其中 29 件根據留存的「佐久間財團蕃族參考品目錄」（簡稱「佐久間目錄」）資料推斷應為「三貂社」之生活器物¹⁵，1 件則顯示來自於淡水地區。物件年代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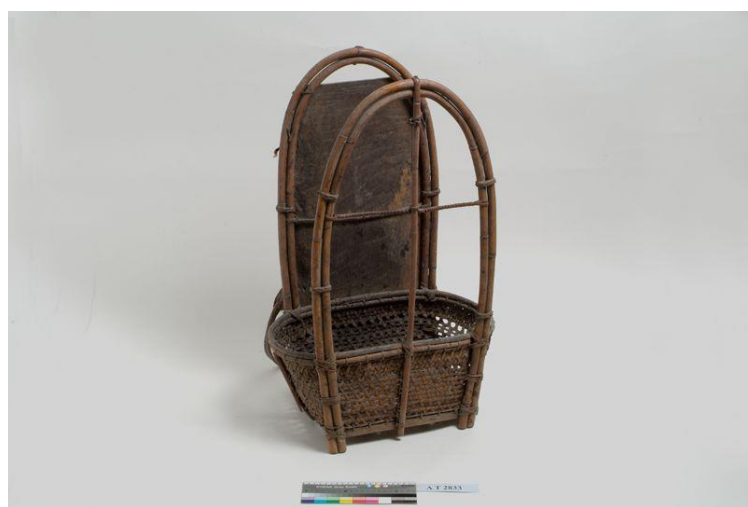
¹⁵ 這 29 件在佐久間目錄中登錄為「舊社平埔蕃」或「新社平埔蕃」，應為尾崎氏依據當時慣用的說法，對歷史上凱達格蘭族三貂社「舊社」、「新社」的各別稱謂。見李子寧 2009：25。

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期，涉及之社會範疇較廣，包括儀式宗教、盛貯收藏、飲食風俗、紡織工藝、音樂、陶藝、裝飾品等七類，以織具、飲食用具數量較多，而主要是各類日常生活器具，但無任何織品。整體而言，帶有傳統色彩者計 20 件，融入外來元素者計 9 件，顯示最少在三貂社，至 20 世紀初仍留存了相當豐富的傳統文化元素，同時也充分融合了外來文化元素。如果我們再考量「佐久間目錄」中登錄的同樣由尾崎氏蒐集，但目前無法於臺博館藏品中確認的其他具傳統色彩的三貂社文物：織具（4 件）、皮兩具（3 件）、木雕板（4 件）、舟隻（1 件），那麼三貂社在 20 世紀初仍持續耕耘傳統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1）占卜祭器：2 件木製雕刻占卜道具箱，其中 1 件利用平雕與彩繪技法，刻畫的主題有漢式瓷瓶、龍燭（龍柱）、招引幡等，結合了傳統祖靈概念及清代歸附賜姓之後「五柱房親」的概念，反映了社會背景的改變。



（2）盛貯收藏用具：為傳統籐籠及儲物籐箱，其中 1 件雙肩背負籐籠可能就屬於清代文獻中所稱的平埔族「霞籃」¹⁶。



¹⁶ 清吳子光『一肚皮集』載：「番俗有負而無擔。家製一竹筐，容三、四斗不等。以籐為帶，長短視人肩膀，籐性柔而韌，故負重不墜落」。

(3) 飲食用具：包括木盤、瓢勺、木湯勺等不同類型，木盤、瓢勺為傳統取用雜食、飲水之器具，木湯勺則是清代漢式飲食習慣傳入後才逐漸普遍的食具。



(4) 織具：族中婦女傳統上以水平背帶織布機製作方布、裙、前遮布等。這一組工具包括圓筒形「經卷」、固定棒、弓形隔棒、活動隔棒、輔助棒、綜統棒等九件配件，「經卷」筒徑小、其函口亦較窄。平埔族婦女使用圓筒形「經卷」紡織的情景常出現於清代風俗圖繪中，如臺博館藏巡台御史林天木「臺灣巡視圖」（摹本）、徐澍「臺灣番社圖」，以及 19 世紀晚期西方觀察家拍攝的早期照片。



(5) 樂器：為 2 件受漢文化影響而產生的手拍鼓，於儀式歌舞時使用。傳統上所使用的原為木敲鼓，除歌舞之外，亦用於傳訊。



(6) 陶器：1 件傳統陶甗，為烹煮米粟的器具。三貂社傳統陶器以手製，器型一般較小，以罐形烹煮器為主，表面或素面或施幾何印紋，其形態與噶瑪蘭族所使用者頗接近。



【圖版 17】陶口緣第一式

(7) 飾品：皆為利用外來物品，如玻璃珠、瑪瑙珠、銅鈴串成的頸飾。早在西班牙人殖民貿易臺灣時就已記載基隆地區的平埔族人廣泛由漢人手中取得瑪瑙珠、玻璃珠，且為族人所喜愛，這類鮮麗的外來裝飾品材料其後亦持續傳入，社民收集這些交易品再行混串，作為服飾配件或串飾，某些則被視為傳家寶物，因此其使用時間頗久。



(三) 西拉雅族

文物及典藏屬性		數量 (28)
入藏年代	1945 以前	8
	1945 以後	20
文物年代	19 世紀末/20 世紀前期	28
指涉地域	臺南	3
	高雄	8
	屏東	0
	花蓮	1
	不明	16
社會文化 範疇	儀式宗教用具	1
	盛貯收藏用具	2
	服裝	23
	飾品	2

資料來源：臺博館藏歷史帳冊、標本帳冊資料

臺博館目前典藏了 28 件西拉雅族生活器物，其典藏年代與其他類別的館藏品不同的是，其以 1945 年以後典藏者為主，多數物件無法指認確實採集地點，物件年代集中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期，而盛貯收藏器亦可能使用至 20 世紀中葉，物件涉及之社會範疇較為單純，僅有儀式宗教、盛貯收藏、服飾三類，服飾品明顯為主要蒐藏類別。整體而言，這些器物均可見長期融合外來元素或採借外來元素的痕跡，以調適於大環境的變遷。根據藏品歷史帳冊資料，1945 年以前典藏者是縱跨頗長時間的收藏結果，1945 年以後典藏者則於 1986-2011 年分批入藏。

(1) 儀式宗教用具：祭祖野豬頭骨

為日治時期典藏品，採集地點不詳。為舊有馘首習俗於清代轉型後產生的「阿立祖」祭儀用具，野豬頭骨、內盛具巫術靈力「向水」的祭祀陶壺、竹祭桿、祭品構成的祭祀情境，傳達了現實秩序與祖靈等超自然世界的緊密關係。如新港社舊時於 3 月 29 日行「阿立祖」大祭，社民備牲禮、菜食等物以祭祖靈，聚飲歌舞並宴賓客以拉近親朋好友社會關係。



(2) 盛貯收藏用具：竹箱、飾品箱

均為近期典藏品，竹箱採自花蓮縣富里鄉移居西拉雅族聚落，飾品箱採自臺南市新港社，俱屬 20 世紀之收貯用具。以「禾間」積貯粟穀是西拉雅傳統收貯的主要形式，清代擇重要的歸附西拉雅部落設立「番社倉」，以方箱連箱堆放的「圭茅」方式儲穀，備諸社民不時之需，移居東部的族人製作的竹箱保存了「圭茅」收貯的習俗，並將其由公共所有轉為家用私人財產的累積，透過文化轉化的方式以進行社會調適，將傳統元素保存至現代。新港社的竹飾品箱之造型則融合了漢式珠寶盒的概念，而以周遭環境較易取得的材料來製作私人用品。兩者同樣都傳達了細膩的生活細節如何與大社會情境並存的調節策略及文化知覺型態。



(3) 服裝飾品：為數量最多的一類，包括各式服裝及其配件 23 件，飾品 2 件。7 件為日治時期典藏品，18 件為近期典藏，採自高雄荖濃溪上游西拉雅族移居部落者佔明顯比例，文物年代以 20 世紀初為主，有日常使用者，亦有儀式時穿戴的服飾，多明顯將市場交換、族群接觸的影響融入整體風格中，傳統織工的重要性較低。整體而言，其服飾變遷因各地與漢族的關係形式而略有不同，但市場的可取得性最終仍成為服飾美學的重要考量，使其服飾文化產生極大變化¹⁷。

服裝類型包括短衣、披肩、頭巾、腰帶、肚兜、繡飾片，材料多來自市場交換所得的布匹，再予以拼縫、織繡、綴飾，形制間亦受漢式服制影響，紋樣則充分融合傳統幾何紋及各種漢式祥瑞象徵，甚至吸收鄰近其他原住民族群的元素，整體呈現出對異質文化元素成熟的融合能力。展現傳統織工的織品（3 件），皆為日治時期典藏品，但採集地點不詳，從中可略窺西拉雅族傳統紡織工藝殘存的精髓，其年代約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

¹⁷ <番俗六考>載：「數年來，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諸番衣禪半如漢人...」，《重修鳳山縣志》載：「邇來漸被聲教，男婦俱製短衫褲，與漢人無異」，《安平縣雜記》載：「四社蕃衣服，...迄化熟後，凡屬番民所穿之衣，與台人閩人無異，惟縫作剪裁，多是仿照粵人體式」。這些清代志書描述均說明 18 至 19 世紀間西拉雅族衣飾文化區域性變遷的軌跡。但不同觀察者，也常注意到不同，甚至是與此相反的現象，如《番社采風圖》即記鳳山縣平埔族人仍多用傳統服飾（杜正勝 1998）。可見西拉雅族的服飾文化變遷圖像實頗複雜，未可一概而論。



飾品分別為玻璃珠串頸飾、玻璃珠貝珠串腕飾，為近期典藏品，採集地點不詳，文物年代約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西拉雅族透過物品交換方式而使用外來玻璃珠的歷史頗久，早自鐵器時代即已開始，這種物品與瑪瑙、琉璃珠、銅環、銅鈴等源源不絕進入西拉雅族社會，在清初早已融入其服飾文化之中¹⁸，與本土螺貝、竹管、草木纖維等飾品並存，且這類玻璃珠飾品在近代常成為家族世代傳承的物品，這也相當程度延長了器物的文化生命，持續在其文化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



¹⁸ 如〈番俗六考〉記北路諸羅番大傑巔、大武壠等社「蕃婦項戴珠串，曰麻海譯」，即指玻璃珠等外來飾品。

蒐藏調性的回顧－歷史上的平埔族群

臺博館平埔族群器物類文物典藏無疑以日治時期的典藏為主體，並與各項歷史文獻素材共同構成一具有時代特色的早期平埔族群文物典藏。稱其為具有「時代特色」，則是因當時蒐藏平埔族群文物多出於搜羅在很大程度上已走入歷史、傳統文化生命力頗為薄弱（最少在當時看來是如此）的平埔族群之各項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證據」、「文化遺物」之思維，因此在概念上實已先畫定「可蒐藏物」的大致範圍，再透過機遇性的或系統性的「蒐藏手段」累積、刻畫所謂「歷史上的平埔族群」的基本形式及其文化風貌變遷的大致圖像。臺博館藏西拉雅族、凱達格蘭族、巴則海（巴宰）族生活器物的典藏格局，一方面受限於此歷史定調，另一方面確也相當程度反映出不同區域因社會環境、近代開發歷史等社會歷史情境的差異性，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顯現的地域文化差異性，以及不同社會場域所顯現的文化韌性差異。

回顧這段典藏歷史，的確此時期對於當時各地平埔族群實際的生活細節，以及這些生活細節可能蘊含的文化元素光譜較乏人問津。其次，地域性差異、社會場域差異性及其蘊含的不同文化知覺型態，這些細膩的文化脈絡與生活景觀如何與大社會情境並存的調節策略，實為 19 世紀以來平埔族群社會頗重要的一項文化命題。日治時期的典藏在某種程度上雖讓我們嗅到了此命題的一絲端倪，然其可能的表述形式與外在表徵，卻未在當時（及其後數十年間）的典藏概念及典藏策略中充分佔有一席之地。隨著日後更嚴密的社會體系發展，這些線索或逐漸消失，或匿跡於更隱晦的文化角落之中，為「博物之眼」（naturalistic gaze）所捕捉到的可能性也更低了。

打破對平埔族群概念上既有的歷史「定格」（stereotyping），重新體察現今逐漸開展的平埔族群文化復振運動之內在與外在脈絡，博物館的平埔族群文物典藏格局與策略才可能逐漸拉近與當代平埔族群文化光譜及文化知覺型態的距離，並與既有的典藏格局重新串連。

參考文獻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1997（1911），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理蕃誌稿第一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市。

伊能嘉矩，1896，〈宜蘭地方に於ける平埔族の雕刻畫〉，《東京人類學雜誌》12（129）：81-89。

——1898，〈台灣及宜蘭方面に於ける平埔蕃族の第一形成地及び其の分岐〉，《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8(3)：385-393。

新井英夫，1936，〈平埔蕃の木彫に就て〉，《科學の台灣》4（4）：14-19。

王瑛曾

1962（1764）《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

王端宜，1974，〈北部平埔族的木雕〉，《臺大考古人類學刊》35/36：83-94。

杜正勝，1998，〈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

- 〈〉，《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頁 1-42，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999，〈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2)：309-361。
- 李子寧，2008，〈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一世紀典藏的故事〉，在李子寧主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專輯》，頁 14-37，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市。
- 2009，〈眼前無路想回頭—再看國立台灣博物館藏北部平埔族的木雕〉，《臺灣博物》103：22-39。
- 阮昌銳，1993，〈噶瑪蘭族的木雕〉，《宜蘭文獻》6：75-87。
- 吳子光
- 2001 (1875) 《一肚皮集》。臺北：龍文出版社，臺灣文獻類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 1-7。
- 吳佰祿，2009，〈天南地北話平埔—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數位典藏的一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主辦「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98 年 12 月 10 日。
- 2011，〈詩韻·畫意·文物風采：中部平埔族群「經卷」的文化意象〉，《臺灣博物》112：50-69。
- 洪麗完，1997，《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裡大社之研究》，稻鄉出版社，臺北縣。
- 翁佳音，2007，《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
- 陳奇祿 1958，〈臺灣的博物館和人類學的發達〉，《臺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創刊號：1-8。
- 陳秋坤，2009 (1994)，《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三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74，中研院近史所，臺北。
- 陳有貝，2007，《臺北縣龍門舊社遺址發掘報告》，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
- 陳文玲、林修澈，2009，《台灣與日本典藏平埔族文物資料調查及研究委託計畫報告書》，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委託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執行研究計畫。
- 陳龍廷，2003，〈相似性、差異性與再現的複製：清代書寫臺灣原住民形象之論述〉，《博物館學季刊》17(3)：91-111。
- 黃叔璥，1957(1724)，《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台北市：臺灣銀行。
- 潘瑋玲，2005，《龍門舊社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瓊瑞，1999，《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東大出版社，臺北。
- 不著撰人
- 1959 (1895) 《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
- Lincoln, Yvonna and Guba, Egon,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